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7 冊

清儒與元史

吳宗儒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儒與元史／吳宗儒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民95〕

杜序 2+ 黃序 2+ 自序 2+ 目 2+16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第 17 冊)

ISBN：978-986-7128-48-5 (精裝)

ISBN：986-7128-48-6 (精裝)

1. 學術思思－中國－清 (1644-1912)

2. 史學－中國－元 (1260-1368)

112.7

95015445

ISBN 986712848-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ISBN：978-986-7128-48-5

三 編 第十七冊

ISBN：986-7128-48-6

---

## 清儒與元史

作 者 吳宗儒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6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 (精裝) 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清儒與元史

吳宗儒 著

## 作者簡介

吳宗儒，臺灣台北人，民國五十七年生，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現任國家公務員。自幼即嗜史，治學則以思想史、史學理論、史學史、政治史、外交史最相契合，著有論文〈清代學風與清儒的元史學〉。

## 提 要

中國的「清學時代」，自明末清初迄於民國初年。這三百年來，展現了兩大學術典範（Paradigm），一是「興樸學」，為傳統中國學術作總整理的功夫；一是「啟西學」，為中國學術開新生命的氣象。換句話說，清學不只扮演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橋樑，也擔負起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推手。清學依時代風尚分成四個時期，即清初學風、乾嘉學風、道咸學風及同光學風，各時期皆有其特色，而皆能紹往開來，推陳出新，導引中國學術洪流不斷向新時代前進。

欲知清學，以清儒一門重要學術入門是絕佳研究途徑。清儒的元史學，因滿清入關而起，因乾嘉樸風而興，因道咸經世而盛，因同光西風而大，聲氣所播，為清代學術界之一大運動。究其所學，反映出五大歷史意義：異族政權的啟示、清代學風的寫照、西北危機的呼聲、中體西用的先河以及清儒傑出的史學。彷彿清儒經學，實不朽之盛業焉。

本書名「清儒與元史」，意欲由清代一門傑出史學，觀清儒治學志趣及一代學風發展，是屬於學術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範疇。文分七章：「第一章：序曲」、「第二章：蒙元史學與元史的問世」、「第三章：清初學風與元史學的初放異彩」、「第四章：乾嘉學風與元史學的啟蒙運動」、「第五章：道咸學風與元史學成熟時代的來臨」、「第六章：同光學風與元史學的極盛時代」、「第七章：尾聲」。

當我覽讀他們的故事及其成就時，彷彿我也置身於清代世界。在提筆寫下他們時，我猶如又看到一群梁山好漢出現在我的眼前。最後，完成本文時，我歡喜無限，好似寫成了一部清史儒林傳。

## 杜 序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史學極盛的時代之一。極富科學精神的歷史考據學，於此時最爲流行，其學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實事求是，不涉虛誕。自清初迄於乾嘉，蓬勃發展，道咸以後，世變日亟，而其學不絕。凡清代最被稱譽的歷史作品，往往是歷史考據學的作品。如顧炎武的《日知錄》，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皆其著者。史學大業，自記注、撰述開其端，而必以考據繼其後。史官的記錄天下事，當事人就所見所聞所歷所思以記載，都是記注之業。網羅前代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以成一家之言，是所謂撰述。撰述有偏失，記注多訛誤，信史不存，實錄蕩然，於是考據出。清代三百年中，史學家前後相繼，傾力爲舊史訂譌文，正誤謬，補闕漏，輯遺逸，「去其一非，成其百是」，歷史的真相，自此出現。此與西方十九世紀極爲流行的科學史學，若相呼應。歷史需真，而考據適以求真。清代歷史考據學的價值，永遠不朽，應不待辯。

清代繼明之後，政治嚴酷，文獄屢興，史學家寫史的自由，遠不能與宋代相比，以致史學上的記注、撰述之業，落於宋代之後。惟自清代浙東史學而言，清代史學的記注與撰述，亦有可觀，不容盡掩。

發源於南宋的浙東史學，至清初以後而大放異彩。大史學家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競出其間。此派史學，與歷史考據學異趨。以存真的精神，撰寫近世當代之史，爲其史學的鵠的；以博大的思想，創垂學術思想之史，爲其史學的新猶；博羅文獻，尋求史義，爲其史學的前景。數者皆是極爲珍貴的史學。所以，《南雷文約》、《南雷文案》、《南雷文定》、《鮚埼亭集》、《鮚埼亭集外編》，無異史官的記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與近代風行的學術思想史，沒有區別；尋求史義，爲史學開蠶叢，《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所扮演的角色，最值肯定。值考據學披靡之日，浙東史學有此建樹，令人驚喜而讚歎。

元史學的研究，也是清代史學的豐功偉績。元代是第一個完全征服中國的外族政權，明兩次設局費時僅三百三十一日修成的《元史》，則是中國正史最陋劣的一部。其中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紕謬累累，不可勝述，史學家深知之。而時值清以外族入主中國，與元入主中國的情況相同，研究元史，遂無禁忌，史學界乃掀起研究元史的風氣。自清出

至清末，名家輩出。其研究初期，集中於糾謬攻瑕，道咸以後，經世思想滲入其中，由元史而及於西北地理；晚清則延及於西學。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柯劭忞的《新元史》，都是巨著。論清代史學，此為重要的一端，而系統的研究，有待後起的學者。

吳君宗儒性情恬淡，獨嗜史學，從輔大歷史系畢業以後，考入政大歷史研究所，選擇清代史學為研究範圍，沉潛其中，如醉如癡。其碩士論文以《清代學風與清儒的元史學》為題，氣勢磅礴，視野寬廣。學風部分，論及清初學風、乾嘉學風、道咸學風、同光學風；元史學部分，以孫承澤、邵遠平、錢大昕、魏源、洪鈞、屠寄、柯劭忞為重心，而涉及元史學研究的人物多至數十人。所須蒐集的資料無窮，所待發揮的議論紛紛，而〈尾聲〉一章，議論、意境、文采，皆臻優美的境界。長期載沉載浮於史料淵海之中，最後能出於其上，瀟灑自如。宗儒應是已完全追入史學的宮殿了。

值宗儒論文即將問世之日，謬贊數語，以為之序。

杜維運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序於溫哥華

## 黃 序

大概十一二年前筆者開始對元史學產生興趣，此緣起於《元史》一書。明初宋濂、王禕等史官僅用了三百三十一天的時間便修成《元史》，其進度之速，真令人咋舌；然而其素質向爲人所詬病；以清人而言，乾嘉大儒錢大昕之評價尤其負面。個人乃對該書的若干問題，如纂修之起迄時間及成書何以如此之速等等問題予以探討，爰成《〈元史〉纂修若干問題辯析》一文（刊登於《東吳歷史學報》創刊號，1995年）。嗣後又對錢大昕之元史研究、邵遠平《元史類編》、汪輝祖《元史本證》等的元史專著，以至趙翼《廿二史劄記》中的《元史》部份及孫承澤、畢沅等人的相關著作，逐一予以鑽研闡述。後乃彙整各文而組成《清人元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一書（台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

中國史學史之研究向來不甚受人青睞，清人元史學尤其冷門。摯友蘇州大學退休教授張承宗先生〈清代的元史研究〉（發表於《史學史研究》，1992年）可謂嚆矢之作，惜失諸簡略，然創始之功固不可抹。吳宗儒先生《清代學風與清儒的元史學》（政治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可謂台灣方面甚早且具相當份量的專著。後得悉宗儒大文乃由筆者素所欽崇之史學大師杜維運先生悉心指導而撰成，宜乎其論文之質素遠在一般碩士論文之上也。

憶1998年初夏，宗儒攜其初成之論文求見，謂由其導師杜維運教授指引而前來者。其肫肫懇懇問難求學之情至今猶歷歷在目，蓋今之古人也。惟以其他考量而未克報考博士，惜哉！

1998年間，筆者正值撰寫《清人元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一書。宗儒之著作適巧成爲拙著最可參考的讀物，而筆者從中實亦獲益匪淺。筆者邊參考該著作，邊隨手糾補其中或不免失誤疏略之處。事後乃原書奉還宗儒，並力促其付梓，以嘉惠學林。惟宗儒謙謹慎重，其事乃一再蹉跎。月前忽接宗儒來電，謂決定出書云。筆者喜不自勝，以其書實嘉惠士林而必可傳也；此爲讀者及學術界而喜也。就宗儒而言，固亦可喜之至，以多年心血結晶之得以“重光”也。筆者有幸獲邀綴數語於簡端，是爲序。

黃兆強序於東吳大學文學院辦公室  
2006年7月4日



# 自序

此書是我民國 87 年 6 月的碩士論文，原名為《清代學風與清儒的元史學》。去年 9 月，始利用公餘閒暇修訂。在保存原文風貌的原則下，只作內容及文字的潤飾校正，並以《清儒與元史》為名出版。邊讀邊校，不時感嘆，若要我重撰本書，恐怕我也寫不出來了。

回憶當初本文撰寫，甘苦不在話下。很感謝杜維運老師的指導與提攜，使我能完成學位。杜老師謙謙君子，平易近人，有傳統中國士人溫文爾雅的典型，也有西方彬彬有禮的紳士風範，可說是與他治中西史學於一爐的形象互相輝映。其謙和敦厚，尤值得我們後輩效法與學習。也很感謝閻沁恒教授及蕭啓慶教授，口試時熱心的指教。當年，三位大師談笑間通過了我的論文口試，並給予我高分成績，使我至今銘感在心。

此外，我也要感謝甲凱老師，在我就讀大學時，啓蒙我很多的史學理念，特別是學術思想史方面。本書之作，有部份原因是來自他的啓蒙。另亦感謝侯坤宏學長及陳祥雲學長，在我就讀碩士班期間對我的照顧。值得一提的是，東吳大學文學院長黃兆強教授，曾對本文細讀與校正，並多次引用於他的力作《清人研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中，增添了本書的光彩。同時，也慨然應允書序，令人感動，在此一併致謝。

畢業後八年來，我立業，也成家了。從三十而立的青年邁入即將四十不惑的中年時，我忽然感悟歷史確是有體有用之學。學生時代讀史，是「實事求是」，到了社會大學，則是「經世治用」。現在，我從事公職，於此體會尤深。所以，公餘閒暇時，仍以讀史或觀賞歷史劇為樂事。誰曰歷史無用？

談到歷史有體有用，我不得不推崇治元史的清儒們。從事歷史研究者，應當效法他們，兼俱「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的精神。雖說歷史之撰，多采多姿，然仍應以關懷國家興衰及生民休戚為重心。若治學，既無益於國家社會，也不通於人情世故，只是淪於學者的玩物之學，則歷史真是無用了，同時也是學者生命的浪費。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最後，特別感謝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對我的信任與支持，使本文有幸問世。此書有任何錯誤疏陋，概由我完全負責，惟幸大雅教正焉。是為序。



# 目

# 錄

杜 序	
黃 序	
自 序	
第一章 序 曲	1
第一節 清代學術的歷史地位	1
第二節 清儒元史學的歷史意義	4
第二章 蒙元史學與元史	11
第一節 蒙元時代的史學發展	11
一、蒙元脫卜赤顏	11
二、元代的史學	14
第二節 《元史》與明儒元史學	17
一、《元史》的問世	17
二、明代學風與明儒元史學	23
第三章 清初學風與元史學的初放異彩	27
第一節 政權轉變與士人抉擇	27
第二節 種族衝突與經世實學	28
第三節 清初元史學之發軔	29
一、孫承澤及《元朝典故編年考》、《元朝人物略》	29
二、邵遠平及《元史類編》	31
三、元儒學案的大創作	34
第四章 乾嘉學風與元史學的啟蒙運動	37
第一節 政治清平與漢學昌盛	37
第二節 乾嘉學風與徵實史學	39
第三節 錢大昕的元史世界	42
一、錢大昕的史學與元史研究的動機	43
二、錢大昕的元史事業	48
第四節 元史研究之建設	52
一、善於元史歸納法的詩人趙翼	52
二、以元史之矛刺元史之盾的吏治家汪輝祖	55
三、有志續宋元通鑑的總督畢沅	60
第五章 道咸學風與元史學成熟時代的來臨	65
第一節 政治中衰與士風覺醒	65
第二節 經世學風再起與西北史地學新興	67
一、經世學風再起	67
二、西北史地學新興	73
(一) 松筠	74
(二) 祁韻士	75
(三) 徐松	76

(四) 李兆洛	78
第三節 元史學成熟時代的來臨	79
一、龔自珍	79
二、毛嶽生	80
三、沈 垚	81
四、張 穆	84
五、何秋濤	87
第四節 魏源與《元史新編》	90
一、魏源經世思想與元史研究	92
二、《元史新編》的史學思想	98
第六章 同光學術與元史學的極盛時代	103
第一節 西方侵略日亟與同光西法維新	103
第二節 西學日趨濃厚與同光學術風潮	105
一、西學日趨濃厚	105
二、同光時代的學術風潮	107
第三節 元史學的極盛時代	109
一、元史學極盛之因	109
二、同光元史學先驅	110
(一) 盛 昱	111
(二) 李文田	112
第四節 《元史譯文證補》的問世與劃時代的元史革命	114
一、西方蒙古學與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114
(一) 西方蒙古學的發展	114
(二) 洪鈞與《元史譯文證補》	116
二、元史研究的人才輩出	121
(一) 文廷式	121
(二) 沈曾植	123
(三) 丁 謙	124
(四) 曾 廉	126
(五) 王先謙	128
第五節 大成時代的來臨	129
一、屠寄與《蒙兀兒史記》	129
(一) 屠寄的史學	130
(二) 《蒙兀兒史記》的特色	134
二、柯劭忞與《新元史》	136
(一) 柯劭忞的思想與學術	137
(二) 《新元史》的特色	139
第七章 尾 聲	145
參考書目	149

# 第一章 序 曲

## 第一節 清代學術的歷史地位

太古官師合一兼，東周諸子開雲天；兩漢經師號獨盛，魏晉哲人術最玄；  
隋唐講佛邀宋辯，元明談理激清顛；古風之後又西風，羌笛之外添新弦。

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常隨著歷史的流變，而呈現不同的時代特色，故有所謂「上古官學」、「東周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以及「宋元明理學」是也。逮至清代，又別開新象，而有「清學」之名。《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傳〉云：

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嗚呼盛已！

清學時代，由明末清初始，至民國初年止（即 17 世紀至 20 世紀初），約三百年。這三百年間，因清儒究心經世實學，反對空疏心學，而興樸學之風。（註 1）樸學是

---

〔註 1〕沈兼士於〈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趨勢〉云：「清代學術是以樸學始，以樸學終。」

（收入《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2 月）

清學一直發展到民國初年。姚從吾先生在民國 52 年 11 月 6 日寫信給他的學生蕭啓慶教授說：「我在北大念書時，頗得名師指導，如屠敬山，柯鳳蓀，張相文先生，都是我大學時代的導師，……所謂乾嘉樸學，是朝夕掛在嘴上的。」（收入於王德毅著的〈姚從吾先生年譜〉，《台大歷史學報》，民 63 年 5 月，第一期）。

所謂「西化學術」者，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始可稱之。周予同於〈「漢學」與「宋學」〉云：「清代三百年得學術思想，雖是「宋學」的反動，但只是「漢學」的復興，而不是新學（西學）的胚胎。」（收於《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巴勒克勞夫（Geoffrey Barraclough）《歷史的主要趨勢》亦云：「中國傳統史學的崩解，如果不是從 1905 年開始，就必須向後推至 1919 年算起。」（*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1978, p.138）

一門講究訓詁考釋的學問，原由考據經學始，後及於小學、史學、子學、金石、輿地、曆算、音韻等學，因旁徵博引，正本考源，無形中對傳統學術作了總整理的功夫。〔註2〕因為清儒貢獻實在太大了，故現代興起研究「清學」的熱潮。〔註3〕

中國的清代，也是西方世界崛起的大時代，所以西學的輸入，是清代學術的另一件大事。明末清初，是西學輸入的初始，當時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傳播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因僅中國少數知識份子參與其中，故影響不大。至十九世紀中葉，西人挾船堅礮利之勢，耀威中原，西學也彷彿如同滔滔江海，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輸入中國，使中國產生了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有了「競譯西書，道藝並重」〔註4〕的劇烈轉變。而這股西風，至今依然狂飆。

總之，我們綜觀清代學術，可知其展現了兩大學術典範（Paradigm）〔註5〕，一是「興樸學」，為傳統中國學術作總整理的功夫；一是「啓西學」，為中國學術開新生命的氣象。換句話說，清學不只扮演了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橋樑，也擔負起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推手。處於如此的關鍵年代，正是清學享有歷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除了「樸學」與「西學」兩大典範外，再由時間發展序列來看，清學也有其內在的歷史變遷，而其變遷又與清代政治社會變動相依。《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循吏傳〉記載了有清一代的吏治興衰：

〔註2〕清代興樸學之風與反宋元明理學有相當的關係。方東樹（1772~1851）於《漢學商兌》序中，歸納清代漢學家罪宋學者有三端，其云：「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紛爭，為害於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為歧於聖道；一則以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為荒於經術。」

〔註3〕有不少近代學者，每以清朝為異族統治且皇權極盛，以及樸學是清儒避難下的產物，而否定清學。故其治思想，不談清學，論史學地位，也言清不如宋，甚至高唱清代是中華文化倒退的時代，此實對清儒誤解而生不公允之論。

〔註4〕《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藝文志〉。

〔註5〕典範（Paradigm）之意，是指某一特定時期，參與某一個研究工作的學術社群，所共同持有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典範」一詞，由美國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於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提出，其意約有五項：

- （1）典範是一套「信念或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
- （2）典範是一種「世界觀」（world view）。
- （3）典範是一種觀察的方式（A Way of seeing）：
- （4）典範是一種普遍性的觀點（A general perspective）：
- （5）典範是最高的「共識單位」（Unit of consensus）：

（詳見吳瓊恩《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民國85年9月出版，頁61~64）

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給。世祖親政，始課吏治，詔嚴舉劾，樹之風聲。聖祖平定三藩之後，與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龍、彭鵬、陳瓚、郭琇、趙申喬、陳鵬年等，皆由縣令洊歷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於斯為盛。世宗綜覈名實，人知奉法。乾隆初政，循而勿失。國家豐亨豫大之修，蓋數十年吏治清名之效也。及後權相用事，政以賄成，蠹國病民，亂萌以作。仁宗矯之，冀滌瑕穢。道、咸以來，軍事興而吏治疏。同治中興，疆吏賢者猶能激昂清濁，以彌縫其間。又遷調不時，雖有潔己愛民者，亦不易自取其職。論者謂有清一代，治民寬而吏治嚴，其弊也奉行故事，實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紀綱漸隳，康、雍澄清之治，藐焉不可見。觀此，誠得失之林也。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傳〉，記載了政治興衰下的學術反映：

明末文衰甚矣，清室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謙益歸命，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而魏、侯、申、吳，山林遺逸，隱與推移，亦開風氣之先。康、乾文治，文教大昌，聖祖賢臣，莫不以提倡文化為己任。師儒崛起，尤盛一時，自王、朱以及方、惲，各擅其勝。文運盛衰，實通世運。此當舉其全體，若必執一人一地言之，轉失之隘，豈定論哉？道、咸多故，文體日衰，龔、魏之徒，乘時立說。同治中興，文風又起。曾國藩立言有體，濟以德功，實集其大成。光宣以後，支離龐雜，不足言文久矣。

蓋文化學術乃時代之精神反映也，往往政治、社會之變遷，亦將引導學術新生命之開展。據此，我們可觀清代學風歷經四變：〔註6〕

- 1、清初學風 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生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
- 2、乾嘉學風 雍正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
- 3、道咸學風 嘉道之世，政治中衰，經世之風又起，思「實事求是」與「經世治用」並重。而漢學不再獨尊，史學意識昂揚，學風發展多元，西方之學初昌。
- 4、同光學風 同光之世，思變日亟，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政立憲，而西風興焉。究西學者思治，研今文者思變，考遼金元西北輿地者思用，務

〔註6〕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一文，分清代「國初」、「乾嘉」、「道咸」三變。本文清初、乾嘉皆引其文。唯道咸、同光相承而不相類，故本文再區別之。

皆期於經世精神。

此四學風，不僅呈現了清學的遞嬗傳承，也說明了清學的歷史地位，故以「清學」之名，鼎足歷代，無愧色焉。

## 第二節 清儒元史學的歷史意義

思欲知悉清學，以有清一重要學術入門是絕佳研究途徑。清儒元史學具有這樣的歷史地位。

清儒元史學，因滿清入主中土而起，因乾嘉樸風而興，因道咸經世而盛，因同光西風而大，聲氣所播，實為清代史學界之一大運動。鄭鶴聲〈清儒對於「元史學」之研究〉云：

清儒的元史學，為有一系統之研究，聲氣所播，實為清代史學界之一大運動。〔註7〕

元史學蓬勃於清代，並非偶然，實當時政治與學風下的時代反映。究其所興，實反映了五大歷史意義：「異族政權的啓示」、「清代學風的寫照」、「西北危機的呼聲」、「中體西用的先河」及「清儒傑出的史學」。

### 一、異族政權的啓示

自古以來，西北即為中國的邊防重地，長期的胡漢衝突融合，寫下不少動人的史詩悲歌。十七世紀，滿清繼蒙元以邊疆民族征服中國，使當時朝野興起了「鑑元知清」的思想。如清太宗詔譯遼、金、元三史，即是政治借鏡的一種表示。後來又有高宗詔修《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正三史之人、地、官、物譯名之舉。

清儒處異族統治下，感受更是深刻。清初有孫承澤者，撰《元朝人物略》感慨自身。錢大昕一生悴力於元史學，「鑑元知清」是他的動機之一。其〈答袁簡齋第三書〉云：

元中書省有右丞相、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參知政事，皆稱宰輔，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為之。平章間有用事者，右丞以下，雖日與聞國政，其委任已輕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漢人，成宗以後，漢人授平章不過李孟、張瑄、王毅三人，右丞以下始參以漢人。

〔註7〕鄭鶴聲〈清儒對於「元史學」之研究〉，載於民國24年12月及25年3月《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及第5期。又收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輯》第二冊，華世出版社，民國68年出版。

然南人初無入中書者，順帝始有危素一人，亦僅得參政耳。〔註8〕  
是「鑑往知來」的一種影射。〔註9〕此又可於趙翼《廿二史劄記》中之〈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元諸帝多大臣擁立〉與〈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獲得印證。  
〔註10〕

魏源更明白表示，元室尊重宋文化，兵不血刃下一統江山，以暗諷清室之濫殺無辜，以及扼殺漢人氣節的種種作爲。其《元史新編》云：

元承遼金入中原，從無變更宋人衣冠及薙髮之事，而金代郊祀，且執玉珪，則並參用漢制，故伯顏下江南，兵不血刃，杭民安堵，亦無一人變動者。由紀律寬嚴，絕無削髮、改衣冠之令也，故其官服制度亦無可考。

〔註11〕

魏源又以元朝末肇提醒當道：

元有天下，其疆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均超漢唐而過之。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僅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不可救者何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公則中外一家，不公則南北瓦裂。元初尚無內蒙古色目，外漢人南人之見，惟中葉以後，始分畛域，凡臺省長官皆蒙古舊人，中書政以賄成，臺憲皆以議值而得，甚至出而分巡者，亦競相漁獵以償債帥，不復知綱紀爲何物。天道循環，物極必反，故不及百年而向之混一者復成輪裂，乘除勝負，理識其固然哉！〔註12〕

因滿清高壓統治所形成的的種族問題，向來是清儒心中的痛，清儒實亦真心企盼消解之。屠寄於《蒙兀兒史記》云：

宜乎種族之禍，于今爲烈已。種族乎！種族乎！彼蒼天者視之，果孰肖於德乎？於戲！元有中國百餘年而亡，清有中國二百六十餘年而亡，謗曰胡漢異種不相容也。彼朱明者，非華族同種耶？何以二百七十餘年而亦亡也？然則自今以往，繼清而起者，勿恃同種相愛，逞其一家天下之私，

〔註8〕《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註9〕牟潤孫〈錢大昕著述中論政微言〉有云：「錢氏借著講經論史，頗有以古喻今，批評清王朝施行政治的微言。」（本文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

柴德廣於〈王西莊與錢竹汀〉一文，更明白的指出竹汀元史學的「鑑元知清」動機。（見氏著《史學叢考》）

〔註10〕詳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九與卷三十。

〔註11〕魏源《元史新編》凡例之第11條。

〔註12〕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謂二世三世至於千萬世，可傳之無窮也。〔註13〕

如此環境，自然使元史研究多了幾分政治情感的投射，故上焉者倡之，下焉者究之，使元史學成爲清代學術中一門很特殊的學問。

## 二、清代學風的寫照

清儒元史學，彷彿見證了清學三百年的歷史。清初，究經世學風，元史研究爲勝國遺老的精神寄託；乾嘉時代，樸學流行，元史爲學者的考據鵠的；道咸經世學風再起，元史學成爲「實事求是」與「經世治用」的利器；同光盛行西潮，元史學首開西史證中史的風氣。

元史學盛於清代，又與清代考據學特別發達有密切的關係。蓋清學向以漢學爲正統，而能以漢學精神治史者，元史學其一也。李思純《元史學》云：

自康乾以來，此一貫之漢學精神與方法，先及群經，次及諸子，而後徐徐以達於史學。又以《元史》在諸史中特爲蕪雜繁難，宜於施用此方法，故致力者獨多，而元史學於以產出焉。〔註14〕

清代能以漢學家之精神方法治史者，固捨諸元史學專門家以外莫屬也。〔註15〕

清儒從事元史研究，好作元、清比較。例如論述元清學風時，有的學者主張元代學風不振。如魏源以「留意於經世，進之於義理」〔註16〕的思想，批評元代學風缺少經世精神，謂其「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歷朝士風之不振，末有如元者」〔註17〕。有的學者卻認爲元儒有講學安民之功。如沈垚云：

自宋王安石引用小人，至金天興之季，中原幾無遺而禍始息。於是江漢先生趙復、魯齋先生許衡，奮起於大亂之後，拯救於焚溺之餘，遂盡革金季惡俗，以開元明之治。二人或仕或不仕，而關繫運則一也。明太祖，嚴刑峻法，誅斬朝士如草芥，而天下不叛者，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成祖靖難之慘，正士皆盡，乃不數年而士氣復振，宋元諸儒講學之功也。講道論德之風，久而成俗，民無異志，士無異習，故雖法慘於上，而俗猶存於下。自宣德至正德，奄寺佞倖，屢汙朝政，而風俗不衰。嗚呼，宋元諸儒

〔註13〕《蒙兀兒史記》卷八〈忽必烈汗本紀〉。

〔註14〕李思純《元史學》，頁52。

〔註15〕李思純《元史學》，頁70。

〔註16〕《元史新編》卷四十七〈文苑傳〉。

〔註17〕《元史新編》卷四十七〈儒林傳〉。